

[一部正面解读中国发展道路的理论力作]

中国发展道路 的意识形态审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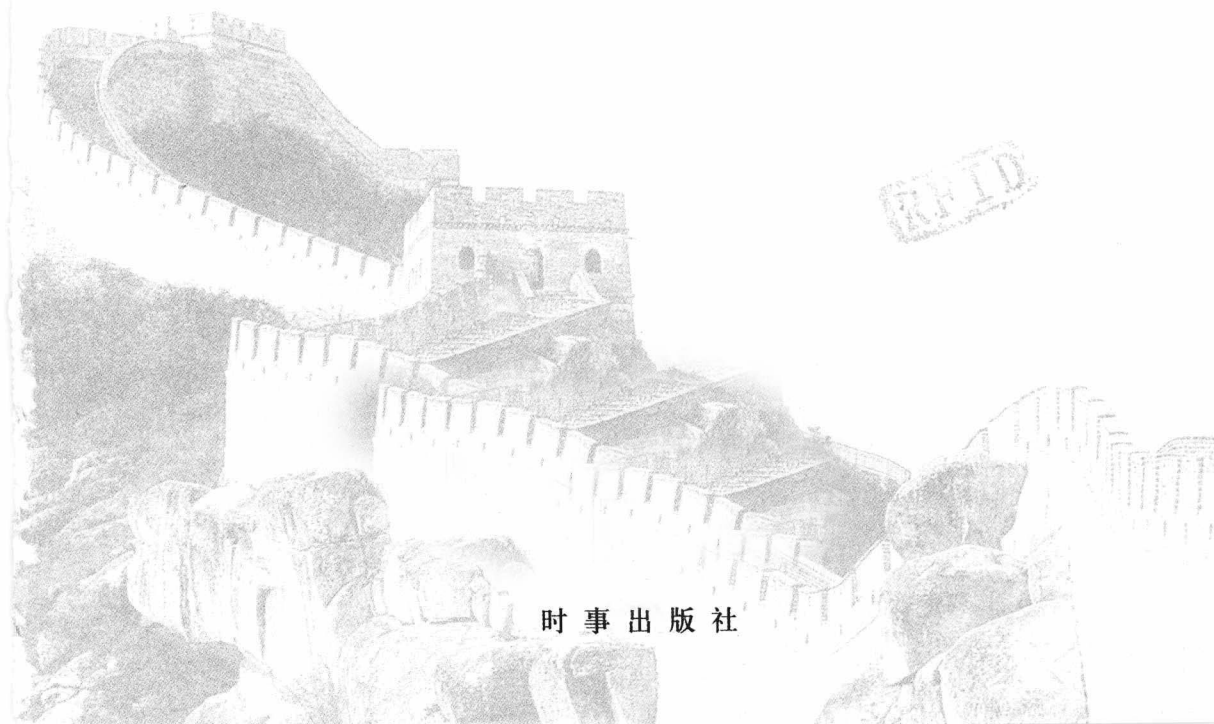
陈 蕾◎著

Analysis on China-style Development
Path from the Ideology Perspective

时事出版社

中国发展道路 的意识形态审视

陈 蕾◎著



时事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国发展道路的意识形态审视/陈蕾著. —北京: 时事出版社, 2012. 10

ISBN 978-7-80232-555-5

I. ①中… II. ①陈… III. ①社会发展—研究—中国
IV. ①D66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225248 号

出版发行: 时事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海淀区巨山村 375 号

邮 编: 100093

发行热线: (010) 82546061 82546062

读者服务部: (010) 61157595

传 真: (010) 82546050

电子邮箱: shishichubanshe@sina.com

网 址: www.shishishe.com

印 刷: 北京百善印刷厂

开本: 787×1092 1/16 印张: 21.75 字数: 252 千字

2012 年 10 月第 1 版 2012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 66.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正确解读中国的关键性问题

摆在我们面前的这本《中国发展道路的意识形态审视》，从政治的角度分析了当代中国社会发展的内在机理，既是对当今热议的“中国道路”、“中国模式”一个有价值的回应，也是对当代社会发展理论的一个梳理和探究。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发展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以接近百分点两位数的经济增长率迅速发展，既突破了社会主义发展的记录，也创造了人类现代化的奇迹。特别是最近十年，世界经济波云诡谲，先后受到亚洲金融风暴、美国次贷危机、欧洲债务危机等引发的严重影响，至今没有缓过劲来。然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却显示出一枝独秀的优越性，中国经济总量2010年跃升到世界第二位。

中国发展成就的强大事实，已经使曾经喧嚣一时的“历史终结论”再一次遁形，连当初这一观点的代表性人物福山近两年也在肯定中国的成就和发展道路。

然而，如何解读中国的发展成就和发展道路，则成为另一个热点问题，这实际上是更为要害的问题。因为这牵涉到中国道路的灵魂、中国发展的思想指导、中国未来的引领和走向，乃至发展中国家对现代化道路的开拓问题。

值得注意的是，即使是一些正面解读中国发展的表述，如“北京共识”、“中国模式”等，也非常清楚地具有“去意识形

态化”的特点，回避“主义”和“道”的问题，只谈“形而下者”和“器”的问题。这同上世纪末，社会主义遭遇重大挫折时，西方学者就极为敏锐地将之上升到意识形态的层面形成强烈的反差。既然将当初社会主义运动的巨大挫折解读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终结，那么，今天中国社会主义的巨大成就对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又意味着什么呢？——西方学者是不会遵循同一逻辑的！

更值得注意的是，社会主义的中国学者似乎也不太关心中国的成功与意识形态的关系，似乎也比较热衷中性化地探讨中国发展的动因，总的来看，对“问题”的关注显然大大超过对“主义”的关注，或许是为了赢得更多的国际认同和反响吧，但这恰恰是遗漏了中国发展道路的灵魂。毫无疑问，“主义”大于“问题”，“主义”是最大的“问题”。

这本书就是分析中国发展道路的“主义”问题，聚焦于意识形态这一中国道路的关键点，这是令人欣慰的。不随大流去堆积“去意识形态化”的文字，坚持自己对“主义”的信仰，相信中国道路有不可或缺的灵魂，从而进行理论的分析 and 探究，既体现了作者的见地，也是对当今理论建设一个有价值的贡献，希望能够引起更多的关注。

全书的逻辑结构十分清晰，从对中国道路、意识形态及其关系的考察入手，对历史进程中意识形态与国家制度的变迁予以理论的解析，奠定起比较厚实的研究基础。继而，把中国道路的探索和开拓与新中国诞生以后思想战线的重大抉择和意识形态的重大变迁联系起来考察，揭示社会主义中国的发展与“主义”问题息息相关，生动地体现了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的能动作用。在此基础上，作者进一步回答了中国道路之所以能够不断创新的重要原因——中国意识形态的创新。中国共产党

人在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不断地在实践中总结经验，形成新的理论，又不断地用新的理论来指导中国道路的开拓。从毛泽东思想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体系，从邓小平理论到科学发展观都鲜明地体现了这一理论创新的特色，决不能离开这一理论特色去解读中国道路的开拓进程。

该书最后落脚到当今中国的一个重大问题：如何坚持中国道路？作者批判了对中国道路的“误读”和“漏读”。把中国道路解释偏了的“误读”要防止，而即使是包含正确的解读，但有意无意“漏掉”了“主义”和意识形态这一关键问题更需要警惕，因为前者还比较容易辨认，不会产生广泛的影响，而后者则容易麻痹人们，不把握住这样一个关键，就难以坚持道路的方向。正是在这一意义上，我们说，意识形态是中国道路的灵魂。该书把重心确立在这样一个重大问题上值得称赞。

该书除了对重大问题把握的优势外，还有一些可圈可点的亮点。例如，对意识形态与发展道路关联的分析具有相当的历史厚度。研究对象的时间跨度从中国古代帝国体制的形成开始一直追溯到当代。使我们可以感悟到，中国之所以走上今天的发展道路，并不是历史的偶然，而是一个有着内在逻辑关联的历史过程，既可以深刻地感受到中国在专制帝制之下形成的意识形态软控制的传统，同时也可以找到近代中国在面临千年局变之际所进行的数次道路探索失败与成功的意识形态根源，以及马克思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对中国社会主义道路的抉择所起的重大影响和决定性作用等等。

作者对意识形态创新内在逻辑的分析是很有力度的。作者认为，我国意识形态绝非一个封闭或一成不变的思想体系，而是一个具有历史延续性、开放性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体系。随着时代的发展和环境的变化，意识形态总是在继承中不断地被

赋予新的时代内涵。但无论意识形态内涵本身如何变化，其中总是存在着一个稳定的、可循的内在逻辑，即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核心，由此而产生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不仅是提供了意识形态本身科学性和合法性的强大支撑，更为中国发展道路的开拓提供了强大的思想引领。马克思说：“理论只要说服人，就能掌握群众；而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① 作者的努力，使其理论阐释具有很好的说服力。

这本书是作者在自己博士论文的基础上深化研究的结果。作者当初是哲学专业的硕士研究生，奠定了比较扎实的哲学功底。在跟随我攻博期间，对政治学理论和科学社会主义原理有了更深的领悟，这样一种学科交叉的优势对她研究这一命题起到了“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的作用，读者可以在本书的论述中看到她的积淀和努力。

当然，要找到青年学者研究的薄弱环节还是比较容易的，但重要的和使我们欣慰的是，该书较好地论述了一个现实的、重大的命题，并且能够给我们启示。

南京政治学院上海校区教授、博导 孙力

2012年9月于上海五角场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9页。

目 录

CONTENTS

导论 研究缘起	(1)
一、现实缘起	(1)
二、理论缘起	(9)
 第一章 相关概念的释义	(15)
第一节 意识形态的基本内涵	(15)
一、意识形态概念的产生、发展与流变	(16)
二、意识形态概念的澄清	(36)
第二节 中国发展道路的内涵及特征	(41)
一、概念的提出——关于“中国模式”	(42)
二、概念的辨析——中国发展道路	(45)
 第二章 意识形态与国家制度变迁的历史考辨	(55)
第一节 儒学的意识形态化与专制帝制的契合	(55)
一、秦汉之际意识形态的三次更迭	(56)
二、意识形态儒学维系下的伦理治国	(63)

三、儒学意识形态教化的实现途径	(67)
第二节 千年局变中的政治理想与道路抉择	(74)
一、意识形态的冲突与晚清改革的失败	(75)
二、新旧的不衔接与共和理想的夭折	(81)
三、马克思主义的“异军突起”与社会主义道路的 抉择	(87)
第三章 意识形态创新中的道路开拓	(99)
第一节 理想漂移下的道路坎坷	(99)
一、理想与现实的博弈	(100)
二、走向异化的革命体意识形态	(110)
三、毛泽东意识形态工作的有益经验和 基本原则	(120)
第二节 真理标准驱动下的道路重塑	(131)
一、历史转折的思想先导	(132)
二、生成改革的意识形态生产	(141)
三、邓小平对意识形态工作的理论和实践贡献	(163)
第三节 先进性追问下的道路自省	(171)
一、延续与坚持的智慧	(171)
二、巩固执政合法性的意识形态生产	(179)
三、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对意识形态工作的 创新与发展	(199)
第四节 人的向度回归中的道路明晰	(204)
一、执政理念的历史转向	(204)
二、凝聚发展共识的意识形态生产	(217)
三、新世纪新阶段中国共产党推进意识形态 工作的特点	(225)

第四章 意识形态创新发展的内在逻辑 (231)

第一节 万变不离其宗：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的 核心地位 (232)

一、历史的逻辑是颠扑不破的延续 (232)

二、理论的逻辑是支撑现实的依托 (233)

三、边界的逻辑是安全稳定的保证 (234)

第二节 识变从宜：坚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 活力供给 (237)

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生成路径 (238)

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现机理 (241)

第三节 运筹帷幄：坚持党领导意识形态的 导向控制 (249)

一、党领导意识形态的可能性分析 (250)

二、党领导意识形态的实现途径 (255)

三、党领导意识形态的现实效应 (260)

第五章 道路坚持与发展中的意识形态鼎新 (264)

第一节 道路解读和演进的意识形态挑战 (265)

一、内容体系在社会动态发展中的解释力 (265)

二、价值追求在多元文化冲突中的信仰度 (270)

三、传播教化在管理应对媒体中的有效性 (274)

第二节 在实践中探寻意识形态创新发展的 现实路径 (277)

一、构筑时代化的意识形态认同体系 (278)

二、壮大时代化的意识形态创新主体 (285)

三、拓宽时代化的意识形态传播渠道	(294)
结束语	(304)
参考文献	(310)
后记	(334)

导论 研究缘起

自2004年乔舒亚·库珀·雷默（Joshua Cooper Ramo）提出“北京共识”以来，“中国模式”就成为国际社会研讨的热点话题。那么，“中国模式”这一概念本身是否合理？而它指的又是一种什么样的发展模式？促进这一模式形成与发展的核心动力又是什么？对于正处于发展关键时期的中国，如何保证在取得改革开放巨大成就之后，依然保持良好的发展态势？对于这些问题，本书将从意识形态的角度给予系统的论证与解答。

一、现实缘起

20多年前（1989年），日裔美籍学者福山（Francis Fukuyama）在美国《国家利益》（第16期）杂志上发表了《历史的终结》（The End of History）一文，认为西方国家实行的自由民主制度也许是“人类意识形态发展的终点”和“人类最后一种统治形式”，并因此构成了“历史的终结”。此论一出，在东西方学术界立即掀起了轩然大波，赞成、反对之声可谓是此起彼伏，很快便形成了一股弥漫全球的“终结热”。然而，理论的假设终究不能替代现实。社会现实的发展已经强有力地给予了驳斥。当前，从世界范围来看，欧洲福利国家正面临着严

重的财政危机，而被称为世界唯一超级大国的美国也因为2007年发生的那场席卷全球主要金融市场的次贷危机而至今一蹶不振，至于日本，当前也正在为如何提升发展活力而一筹莫展……相对于资本主义所遭遇的困境，实行社会主义制度的中国却正在以其独有的方式走出了一条被世人称奇的道路。如今，中国保持了改革开放三十多年的高速增长的气势，国内生产总值位居世界第二，出口贸易和外汇储备位居世界第一……可以说，中国创造了许多世界经济增长史上的新纪录，被世人誉为“中国奇迹”。“中国模式”、“北京共识”的说法也因此在国际范围流行，成为国内外学者热议的话题。如今，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现代化的速度、综合国力的强弱已经不仅仅是决定着本民族的命运，同时也深刻地影响着全人类发展的进程和趋势。就目前情况而言，虽然我们不主张过分张扬和对外输出所谓的“中国模式”（笔者更趋向于用“中国发展道路”这一概念），也认为世界上并没有一个什么统一的模式，但处大国之势、行强国之道的中国能否持续走好这样一条发展道路，依然是具有挑战性、探索性和创新性的时代重大课题。

纵观国内外对此类问题的研究，关注的焦点大多集中于中国在经济领域所发生的变革，以及在经济发展方面所取得的成就和呈现出的特征。一个国家发展的动力不仅来源于经济与社会的发展，同时更来源于发展战略与策略的指引。事实上，中国之所以能取得今天的辉煌成就，与中国共产党作为关键因素的政治领导所发挥的至关重要的作用是分不开的。而党的政治精英在敏锐把握和平与发展时代主题与准确判断中国自身国际定位的前提下，采取的渐进主义和经济发展优先的改革策略，以及通过这两种改革策略，使政治和经济形成一种良性的循环

机制，则是其中最为核心的内容。无疑，发展战略与策略都应隶属于意识形态的范畴，因此，当我们认清发展的动力机制之后，我们就会自然而然地得出这样一个结论，那就是：意识形态在国家发展演进的过程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设计、引领、开拓和存续的功能。由此可见，我们所取得的成就不仅在于经济方面，同时还在于我们在意识形态创新发展方面所取得的卓越成就。可以说，正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我们通过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探索和实践形成了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设计、指引并开拓了今天相对具态的中国发展道路。换句话说来说，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是中国发展道路的核心内容和生命力所在。

作为观念的上层建筑，意识形态是建立在一定经济基础之上，与社会经济、政治直接关联，并代表着一定阶级、阶层和利益集团根本利益和价值取向的社会意识。它通过具有一定群众基础的、广泛宣传和广为知晓的关于经济、社会、政治、文化诸领域的宏观价值理想和微观制度设计来为政治秩序提供合法性的证明，为社会确立普遍的价值导向。由于它可以有效地整合社会有机体，因此还常常被看成是团结统一社会的“水泥”。因此，意识形态事实上是推动国家和社会发展的一支不可替代的重要力量。在我国，早在周朝，古人就已经认识到了意识形态（统一思想）的重要性。作为一个文化、技术和生产力都落后的民族，周之所以能推翻拥有大量物质、财富、武器和车马的殷商王朝，靠的就是文化怀柔和道德训诫的手段。而秦汉之际意识形态的三次更迭，不仅引发了帝国统治者统治方式的巨大转变——从暴政转变为“诛心”，而且也在一定程度上促成了具有高度集权特征的、以宗法制为基础的专制帝制。期间，作为被统治阶级接纳、改造和推崇的儒学在成为国家意

意识形态之后，它的作用不仅仅是保证了专制帝国长达两千多年的稳固统治，而且其本身也逐渐演变成为一种内化的民族性格，直到今天仍对国人产生正负两方面的影响。也正是因为意识形态儒学对国人产生的深刻影响，在帝国千年剧变之时，社会上的有识有志之士才会无一例外地都试图从思想运动出发来推动整个社会的变革。在此进程中，共和理想之所以无法在当时的中国取得成功，其根本原因在于虽然实体的帝国已经覆灭，但封建余脉仍在人心盘旋，以自由、平等、民主为核心的西方政治文化并没有成为中国老百姓乃至那些打着共和宪政口号的所谓精英们的真正信仰。与此相对照，面对同样的国情，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能领导中国人民取得革命的最终胜利，是因为中国共产党能够结合革命实践对马克思主义进行灵活地、创造性地运用。这便是实事求是、解放思想在我们选择并确立社会主义道路的过程中所发挥的至关重要的积极作用。因此，实事求是、解放思想一直以来都作为我们学习、研究和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核心原则被不断地加以继承和发扬。

当我们回顾新中国的发展历程，其中既有成功的经验，也有失败的教训。“文化大革命”就是我们必须引以为戒的教训，而改革开放则是我们最重要的经验。“文化大革命”从一定意义上来说，是一种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意识形态扭曲发展的恶果。不可否认，以阶级斗争为基础的意识形态对于刚刚建立政权的新中国来说，的确发挥过巨大作用，因为正是这种意识形态的斗争性激发了人们努力将艰难生存于资本主义世界中的社会主义国家建设好的斗志和决心。但若长期、过分强调意识形态的斗争性则会危及社会和谐、影响社会发展。事实证明，在我国，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基本路线最终演变为了了一场可怕的历时十年之久的社会大动荡，从而使中国的社会主义道路一度深

陷坎坷之中。

然而，恰恰是这样的坎坷和教训给了中国共产党人反思与反省的机会。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在痛定思痛的基础上逐渐形成了一种新的决策逻辑，那就是：什么是社会主义？过去并没有搞清楚，但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就是要让人民富裕起来→要使人民生活好起来，就要发展生产力→要发展生产力，就要改革开放，就要搞市场经济。当然，从决策的最初构想到实现并不是一蹴而就一帆风顺的。就改革以前中国社会的组织和发展所依靠的全面控制社会精神领域的意识形态的状况而言，这场变革首先遇到的阻力就是来自该领域的。甚至在“文革”结束以后，这种阻碍仍然十分严重，最典型的表现就是“两个凡是”的提出。于是，针对“两个凡是”的一场由政治权威引领的思想解放运动就此孕育而生。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吹响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思想解放运动的序曲。虽然关于真理标准问题自身性质的问题属于认识论的范畴，但这一讨论却在现实中为意识形态的转型和重塑提供了契机和突破口。高举马克思主义伟大旗帜，正确对待毛泽东思想，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作出判断，将促进生产力发展、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作为中心任务，强调“三个有利于”成为这一阶段意识形态创新与发展的主要内容。事实证明，通过对意识形态的转型和重塑，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不仅继承了毛泽东时期原有的强大的政治资源，而且还通过思想解放的形式，赋予中国社会主义制度以新的生命力，从而也为之后我们突破传统社会主义的观念束缚，走社会主义公有制和市场经济相结合的发展新模式提供了思想的指引和制度的设计。

江泽民是在国际国内风云变幻的特殊历史时刻走上中国

共产党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核心岗位的，可以说是受命于危难之际。面对 20 世纪 80 年代末 90 年代初世界社会主义事业所遭受的严重挫折以及国内 1989 年春夏之交的政治风波的不良影响，党内党外出现了一些质疑社会主义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声音，甚至一度威胁到了政权的稳定和党的执政地位。因此，针对不断变化的外部环境，如何顺利实现党的历史方位的转变（由革命党到执政党的转变），重塑党的执政合法性就成为稳定政治局面的关键性问题。“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包括“政治文明”观点的提出就是在这样一个背景之下产生的。通过对中国共产党执政合法性的时代性诠释，“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确立起了党的“先进观”和“代表先进”的执政意识，从党的自身建设的角度勇敢地破除了无产阶级政党天然先进的思想误区，彻底改变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两极对立以及单纯以资本主义制度为坐标反向定位社会主义的思维方式。这一重要思想的提出不仅标志着中国共产党一整套意识形态理论的形成和中国共产党在意识形态斗争方面的成熟，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消除了人们的疑虑、确保了政权的稳定 and 政策的延续性，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重要的支撑和保障。

2002 年以胡锦涛为核心的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登上了历史的舞台，摆在他们面前的历史使命就是如何顺利地解决改革过程中所产生的一系列体制性问题，继续走好中国特色的发展之路。很显然，领导人将目光放在了“人”这个问题之上。因为，随着社会改革的全面推进，发生巨大变化的不仅是整个国家的经济面貌，同时还有人的思想意识。如今在我国，“人民”作为一个政治概念，可以说它的阶级属性正在减弱，而它的法律属性却在不断增强；同时，作为一个群体